

# 追根溯源、鉴古知今

——实现语言类型学的现代化

罗仁地 著

杨旭 译；罗仁地 校

**摘要：**语言类型学以及更普遍的语言学，在 19 世纪的洪堡特和甲柏连孜等学者那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他们认为每种语言都表现出独特的世界观，研究和比较这些世界观至关重要。这一传统依然存在，只是由于结构主义的兴起，多年来遭到了搁置乃至诋毁，因为结构主义试图脱离语言和社会文化环境来研究语言结构。本文回顾了早期学者的认识，指出他们与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和互动语言学等前沿理论的相似之处，这些观点因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不得不再被重新发现。我们主张通过追根溯源、鉴古知今的办法来使语言类型学（以及更广泛的语言学）更加现代、科学和实证。

**关键词：**语言类型学；洪堡特；结构主义；浪漫主义；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互动语言学

## 0. 引言

有一种常见的看法认为，对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即语言类型学，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但事实上在他早 150 多年前的欧洲，就由浪漫主义运动学者开始了，特别是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的追随者。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普鲁士学者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他研究了 75 种不同的语言，目标是了解不同语言的使用者对世界的认知构建（Weltansicht），也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语言使用者所表现出的认知范畴，因为每种语言都反映了一套独特的认知范畴。

在洪堡特之前，多数比较都只限于词汇，但洪堡特主张更全面的记录，包括在收集大量自然语料的基础上编写完整的语法，因为只有在对个别语言进行完整记录，才能对它们进行比较。他认为，每种语言都表现出独特的世界观，语言学的目标应该是了解这些世界观，以及不同文化在这方面的差异。由于他认为只有在连续语篇中才能发现认知范畴，所以他认为语言记录和类型学密切相关。

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1785-1863；威廉·格林，1786-1859）受到赫尔德的影响，开始对德语使用者的世界观感兴趣，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民间诗歌和故事，对其进行严肃的比较，《格林童话》（1812-1858，由 *Kinder und Haus Märchen* 出版）就是这一实践的一个产物。

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后期，出现了乔格·冯·德·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和弗朗茨·博阿斯（Franz Boas）；在 20 世纪初，又出现了博阿斯的学生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sup>1</sup>以及萨丕尔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李方桂、玛丽·哈斯（Mary Haas）、斯坦利·纽曼（Stanley Newman）、乔治·特拉格（George Trager）、查尔斯·沃格林（Charles Voegelin）和莫里斯·斯瓦德斯（Morris Swadesh），以及他们的学生，如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和詹姆斯·A·马提索夫（James A. Matisoff），等等，一直到今天。这一传统继承并发展了洪堡特提倡过并由格林兄弟实践过的语料收集方

---

\*原文：LaPolla, Randy J. 2020 Forward to the past: Modernizing linguistic typology by returning to its roots.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1:147-167.

<sup>1</sup> 博阿斯和萨丕尔也受到了赫尔德和洪堡特的直接影响（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海曼-斯坦塔尔（Heymann Steinthal, 1823-1899）在洪堡特去世后汇编的部分作品）。萨丕尔 1905 年的硕士论文讨论的是赫尔德的《语言的起源》（*Ursprung der Sprache*）。

法，以此作为理解说话者的世界观的数据来源。<sup>2</sup>但由于某些政治、哲学思潮的流行，尤其是结构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方法不仅多年来被大多数人忽视，而且在萨丕尔和沃尔夫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去世后受到不公诋毁。<sup>3</sup>

60年代中期，格林伯格主张结构主义的语言比较法（如 Greenberg 1963），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语言类型学的兴趣，尽管这种方法只关注脱离语境的结构模式。

我在本文中想论证的是，我们应该重新捡起对不同语言使用者所使用的语言结构背后的认知范畴的兴趣，以理解使用者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不仅会关系到我们如何做类型学，也会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语言的本质。正如 Tobin（2006: 171）所认为的，“一种理论持有是什么样的语言定义，就创造了什么样的研究对象。”为了论证这一点，我将回顾浪漫主义传统对语言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如何在当前最前沿的语言学思想中得到回应。我认为，我们应该像过去那样理解语言以及分析语言，这样才能使语言类型学（以及更广泛的语言学，因为类型学是所有语言学的基础）更加现代、更加实证以及更加具有解释力。

### 1. 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

洪堡特是普鲁士的男爵，做过一段时间的外交官，同时也是政治哲学家、教育家和杰出的语言学家。作为教育家，他创办了柏林大学，并在普鲁士的各个年级实行标准化教育。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家，他撰写过一篇捍卫自由的文章，后来影响到约翰·S·米尔（John S. Mill）的《论自由》一书。但洪堡特后来放弃了政府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了语言学研究。他在出版的作品中提到了75种不同的语言，但最著名的对巴斯克语和卡维语（旧爪哇语）的研究。

洪堡特对语言、认知的理解与19世纪初普遍持有的传统观点不同，但与21世纪语言学“认知转向”和“实证转向”之后的新发现非常一致。在洪堡特之前，人们大多遵循 Aristotle（1962）的观点，即概念对所有人类来说都一样，只不过在不同语言中关联着不同的词。但洪堡特并不这样认为：

“……语言作为一种手段，主要不是表现了已经认识到的真理，而是为了发现过去未知的真理。语言的多样性不是体现在声音和符号上，而是体现在世界观上”。（Humboldt 1903-1936, IV: 27<sup>4</sup>）

“词……并不像一个物质实体那样传递某种现成的东西，也并非包孕着一个已定形的、封闭的概念，而是要起刺激的作用，促使听者独立自主地构成概念。……”（Humboldt 1836[1988]: 151; 洪堡特 1999: 201<sup>5</sup>）

“……一些不同语言的词可以表示相同的概念，但它们绝不会是真正的同义词。”（Humboldt 1836[1988]: 166-7; 洪堡特 1999: 224）

洪堡特非常清楚，当一个人学习与自己的母语结构非常不同的第二语言时发生了什么：自己母语的思维习惯被用来说另一种语言，结果会产生与另一种语言的母语者非常不同的模式（比较 LaPolla 2009）。

与后来的结构主义者不同，洪堡特并不认为交流是交换符号：<sup>6</sup>

---

<sup>2</sup> 例如，李方桂（1951[2013]）讨论了为何需要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以及为何需要根据语言自身的特点来理解其表现出的认知范畴，而不是将一种语言的范畴应用于另一种语言。

<sup>3</sup> 许多教科书中提到（常常是否定的态度）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并不是由萨丕尔或沃尔夫创造的；它是支持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学者，特别是埃里克·伦尼伯格（Eric Lenneberg），为了诋毁萨丕尔和沃尔夫，而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扭曲之后树立的一个靶子（如 Brown & Lenneberg 1954）。那些跟风否定“决定论”或“强势版本的理论”的人，其实是在追随伦尼伯格，实际上可能没有读过萨丕尔或沃尔夫。

<sup>4</sup> 原文引用的并非德文，而是 Trabant（2016: 135）的英译。——译者注

<sup>5</sup> 这是中译本的引文出处（添加了相应的参考文献），个别地方可能有所修改，下同。——译者注

<sup>6</sup> 可与 LaPolla（2015）的观点比较：他认为交流是基于溯因推测，而非编码和解码。

“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并不是因为他们依靠符号表达事物，也不是因为他们相互制约，准确、完整地产生出同样的概念，而是因为他们互相都在对方的身上触动了感性表象和内在概念活动的链锁上的同一个环节，击中了各自的精神乐器的同一个音符。所以，各人形成的其实不是同一个概念，而是相对应的概念。……在称谓一个最普通的事物如一匹马的时候，人们指的是同一种动物，但每个人都把独特的想象塞进了马的名称，……”  
(Humboldt 1836[1988]: 151-2; 洪堡特 1999: 201-202)

另外与结构主义者不同但与现代互动语言学（如 Hopper 2011、2012）很像的是，洪堡特认为语言本质在于互动：“言语之所以可能，是由一问一答决定的。”(Humboldt 1997: 132)。他理解语言的动态性质，认为语言是一种活动而非事物，是一种历史上不断变化的现象，他对后来结构主义所持的脱离语境的“积木式”方法提出批评（很有先见之明），认为语言整体必须在连续语篇中被观照：

“语言就其真实的本质来看，是某种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事物。即使将语言记录成文字，也只能使它不完善地、木乃伊式地保存下，而这种文字作品以后仍需要人们重新具体化为生动的言语。语言绝不是产品 (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 (Energeia)……也只能把这种讲话行为的总和视为语言。因为，在我们习惯于称之为语言的那一大堆散乱的词语和规则之中，现实存在的只有那种通过每一次讲话而产生的个别的東西；这种个别的東西永远是不完整的……语言中最深奥最微妙的东西，是无法从那些孤立的要素上去认识的，而是只能在连贯的言语中为人感觉到或猜度到。这一点更能够说明，真正意义的语言在于其现实发生的行为之中……而把语言分解为词和规则，只不过是经科学剖析得到的僵化的劣作罢了。”(Humboldt 1836[1988]:49; 洪堡特 1999: 56-58)

他理解环境的重要性，所主张的看法与现代构式方法不谋而合：

“……具体要素的意义，……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内容，而一旦我们把言语分析成单个的要素，这种内容也就不复存在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词是通过它所出现的上下文的联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Humboldt 1836[1988]: 154; 洪堡特 1999: 205)

Humboldt (1827) 对古汉语的讨论非常有见地，即便放到今天也是毫不逊色的（比较 Swiggers 1986）。他在分析时参考了著名汉学家雷慕莎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的研究，而且该作品还是写给雷慕莎的，但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洪堡特主张根据汉语和其他非印欧语的自身特点进行分析，而不是把印欧语的范畴强加给它们，因为他认为语法范畴是取决于具体语言的，语言之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类似的范畴。正如 Joseph (1999: 103) 所指出的，“洪堡特一再强调，如若在分析非西方语言时使用西方的语法范畴，以及把翻译作为分析的基础，那么我们将无法看到这些语言的真相。”遗憾的是，这些错误的做法在今天依然盛行。由于洪堡特没有死抱着西方的语法范畴，所以能够认识到汉语没有表现出印欧语的语法关系，以及没有固定的词类；他指出，词语的功能必须通过其出现的环境来决定——这些事实之后将被再次独立发现。<sup>7</sup>洪堡特意识到，交流须在语言形式之外进行推测，语言在使用强制黏着形态对推测进行制约的程度有所不同 (LaPolla 2003、2015 独立提出了与此类似的观点)，而古汉语是一种较多依赖推测的语言（比较 Serruys 1981；王力 1985；王克仲 1986；Herforth 1987 的类似观点），但这并不对交流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是他提到汉语“卓越之处”的部分原因，因为汉语在表达想法时直截了当、简明扼要（类似于数学公式）。当然汉语也有标志词 (particles)，在作者需要时可以用来制约对词语之间关系的理解。他还认识到成语在这门语言中扮演的角色。

---

<sup>7</sup> 试比较：黎锦熙 (1924、1953) 认为汉语没有词类，词只在特定句子中才有功能；LaPolla (2013) 认为，应该采用构式法来解决普通话中的词类问题。此外，LaPolla (1993) 讨论了普通话中的语法关系的问题，可以参考。

## 2. 乔格·冯·德·甲柏连孜 (1840-1893)

甲柏连孜是洪堡特和海曼·石坦达尔 (Hermann Steinthal) 的追随者。与洪堡特一样, 他认为语言展示了说话人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它代表了一个民族如何思维的概念整体, 是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的最直接和简洁的表达, 包括事物整体被思考的形式、秩序和关系等。” (von der Gabelentz 1891[1901]: 76)。他认为语言是一种动态现象, 语言历史的动因是在“追求舒适” (*Bequemlichkeitstrieb*) 和“追求明细” (*Deutlichkeitstrieb*) 之间达成平衡。这带来的结果是得失交替的循环, 即从孤立语到融合语 (*fusional*), 再回到孤立语, 他把这个过程比作螺旋 (von der Gabelentz 1891[1901]: 251)。<sup>8</sup>他也因其比较研究被看作类型学的奠基人, 也正是他创造了“类型学”一词。他有时也被看作是早期的结构主义者, 因为他把语言看作一个系统: “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系统, 其中所有部分都有机关联, 协同作用。” (von der Gabelentz 1891[1901]: 481; 甲柏连孜 2020: 245) 然而, 他的做法与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并不相同。例如, 他写了一本古汉语的参考语法 (Gabelentz 1881; 甲柏连孜 2015), 认为汉语词类只能通过使用来判断 (这一点和洪堡特一样)。<sup>9</sup>甲柏连孜还发展了与语法主语和谓语不同的“心理主语”和“心理谓语”概念, 这些概念后来发展为话题-述题 (*topic-comment*) 和主位-述位 (*theme-rheme*) 概念。他还预示了 Halliday (1994) 的聚合 (相对于组合) 语法概念, 以及我自己的关于溯因推理在交流中的角色的观点 (LaPolla 2015), 因为他支持语法同义 (*grammatical synonymy*) 概念: 你无法完全理解某人所说或所写的内容, 除非你知道他放弃了哪些其他同义的说法, 以及他为何做出如此选择 (von der Gabelentz 1881: 353-354)。

## 3. 弗朗茨·博阿斯 (1858-1942)

博阿斯是一位德国物理学家和地理学家, 由于德国对犹太人的歧视, 他移民到了北美。一开始, 他在加拿大为偏远地区绘图, 从那时开始, 他迷上了那里的原住民 (伊努伊特人; 1883-84) 文化, 转而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工作。他于 1887 年搬到美国, 从 1897 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教。他被认为是现代专业人类学和民族学之父。他将人类学划分为四个领域: 文化 (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物理 (生物)、语言和考古研究。

博阿斯主张, 语言和文化 (心理) 分析须基于从田野调查实地收集来的语料, 因为他认为文化和思维方式要通过自然语料得到揭示 (比较洪堡特对“连续语篇”的要求)。博阿斯强调“本土视角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的重要性, 因为每种语言的世界观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有语言都因其不同的世界观而具有同等价值。正因为他明白这个道理, 进而主张分析美洲语言时要根据其自身特点, 而非套用印欧语的范畴, 此外要采用基于真实语料的归纳方法 (Boas 1911) ——这仍然是今天语言记录的主要方法。现在所说的“博阿斯三部” (参考语法、长篇语料集和词典; 由洪堡特首倡) 也成了语言记录的标准做法。

## 4. 为什么博阿斯和萨丕尔会提出语言平等的观点?

19 世纪早期类型学方面的努力启发了一批类型学家 (如 Burnouf 1825; Steinthal 1850、1860; Renan 1858; Gobineau 1854-1855; Beames 1868), 他们不仅根据形态多寡来给语言分

---

<sup>8</sup> Humboldt (1827) 和 Gabelentz (1891[1901]) 都理解我们现在所说的语法化。

<sup>9</sup> Bisang (2013) 对《汉文经纬》 (*Chinesische Grammatik*) 的理论结构和见解作了有趣的讨论, 可以参见。这部作品 (《汉文经纬》) 没有英译本, 但有姚小平的中译本 (2015 年)。另外, 柏寒夕 (2013) 的博士论文、李保平 (2010) 硕士论文研究了此书。

类,而且还根据他们提出的演化程度加入了价值判断,即:语言在演化之梯上处于不同阶段,这反映说话者的文化和智力水平。汉语和其他“单音节”语言几乎没有屈折和融合形态,表面上看对应着初级的、演化程度较低的思维方式,因此被认为处于 Steintal 的语言演化之梯的最低层。<sup>10</sup>但是如上所述,博阿斯认为所有语言都有同等价值; Sapir (1921: 第 10 章)也反对把文化发展和语言结构关联起来:

“企图把语言形态的某种类型和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联系起来,总是徒然的。说实在的,这种联系起来是说废话。……在文明进化的任何水平上都有形形色色的单纯类型和复杂类型的语言。就语言形式说,柏拉图和马其顿的牧猪奴是同伙,孔夫子和阿萨姆的猎取人头的野人是同行。”(萨丕尔 1985: 196)

Sapir (1921: 第 11 章)认为,语言不同但都有价值,就像艺术作品的媒介不同一样;不同的材料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

“语言是文学的媒介,就像大理石、青铜、黏土是雕塑家的材料。每一种语言都有它鲜明的特点,所以一种文学的内在的形式限制——和可能性——从来不会和另一种文学完全一样。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模子的色彩和线条。”(萨丕尔 1985: 199)

## 5. 萨丕尔、沃尔夫对语言、认知的认识

像洪堡特、甲柏连孜和博阿斯一样,萨丕尔和沃尔夫认为每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即一种理解现实的方式。也就是说,语言反映了说话者的认知范畴(即萨丕尔在下面引文中提到的“民族的语言习惯”)。

“人类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人们一般理解的社会活动世界中,而是生活在已成为该社会表达中介的具体语言的掌控之中。认为无须使用语言就能适应现实,认为语言不过是交流和反省问题的次要手段,这些都是无根据的幻想。事实是,‘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建构于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之上……我们之所以有现在的这些视觉、听觉及其他经验感受,都是因为我们所在社会的语言习惯预设了某些理解方式。”(Sapir 1929[1949]: 162; 萨丕尔 2011: 97-98)

这里的意思是,我们的世界观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中,当儿童学习语言时,他们也学到了该语言中的范畴和世界观。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已故的梅丽莎·鲍尔曼(Melissa Bowerman)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语言影响着范畴的发展(如 Bowerman 2004、2007; Bowerman & Choi 2003)。例如, Bowerman 和 Choi (2003)展示了韩国儿童在学习韩语过程中学得其空间概念的过程,他们认为这就好比音位类别的发展:最初,孩子可以做出许多区分,但后来只能区分语言中存在的模式。正如沃尔夫所解释的,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现象,只是我们对世界经验做了不同的理解和分类:

“……语言将经验组织起来。我们倾向于把语言简单地当成一种表达的技术,而没有认识到,语言首先是对流涌的感性经验的分类和组织,它产生出某种世界秩序。运用特定的符号象征方式,一种语言很容易将世界的某个部分表达出来。换言之,语言与科学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虽然语言不像科学那样精致,却比科学涉及更宽广的范围,显

---

<sup>10</sup> 洪堡特有时被不公正地指责为“种族歧视者(racist)”(如 Aarsleff 1988)或“种族主义者(racialist)”(如 Harris & Taylor 1997),但是 Joseph (1999)驳斥了这种说法。洪堡特其实很早就主张公正对待犹太人,也发表了大量关于汉语“卓越之处”的言论,如 Humboldt (1827)和 Humboldt (1836[1988]: 230-31)。他认为,汉语不是一种原始语言,而是具有“适合智力水平最高发展的形式”(Humboldt 1827: 302; 原文所引英译来自 Joseph 1999: 138)。洪堡特也是主张将另一种亚洲语言梵语视为隶属于印欧语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姐妹语言的学者之一(这是早期印欧语研究中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并主张梵语在文学和文化方面具有与其他语言一样的价值。

示出更多样的能力。”(Whorf 1956: 55; 沃尔夫 2001: 23)

## 6. 新语法学派 (19 世纪末)

这里简要评论一下新语法学派,一方面是为了讨论的完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些浪漫主义者(如格林兄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新语法学派学者,而一些新语法学派学者(如索绪尔和布隆菲尔德)又成为了著名的结构主义者。新语法学派主要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比较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他们提出了“新语法学派假说”,即所有语音变化都有规律(规则支配,没有例外)。这种提出可证伪假说的做法,是使语言学变成科学的早期尝试。他们认为语音层面具有相对于句法和语义的自主性,并且将其视为重中之重(因为它是最可观察的)。他们没有把语言看作一个系统,而是看作个人言语中的可观察物。根据 Weinreich, Labov & Herzog (1968) 的说法,这就产生了语言具有同质性的观点,这种被后来结构主义方法认同的观点其实存在问题。

## 7. 结构主义 (19 世纪末至今)

结构主义与新语法学派的区别在于,他们把语言看作一个系统: *un système où tout se tient* (“一个所有(部分)互相牵制的系统”),并且被认为主要是在研究语言的所谓静止状态,而不是采取一种历时或动态的视角。如上所述,尽管一些新语法学派学者成为重要的结构主义者,但在这两个方面都与新语法学派的“原子主义”和历史关注形成对立。

结构主义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来自欧洲的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他主张(Saussure 1916)语言学属于符号学(semiology/semiotics)即符号研究的一部分,是一门研究语言系统的科学。他将语言区分为语言(*langue*,即说话者心中的系统)和言语(*parole*,实际说出的言辞)。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自主的同质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其系统和意义不受社会、心理和语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观点是存在问题的,事实上当时并非所有的结构主义者都认同。对索绪尔来说,范畴不是由实体定义的,而只是由关系定义的,而且必须是离散的。他还将语言系统从时间中分离出来(比较:Hopper 1992; Auer 2009; Auer et al. 1999 试图将时间重新纳入考虑范围)。

在美国,布隆菲尔德(1887-1949)认为(Bloomfield 1933),口头表达的所有相关方面都可以基于严格的形式标准来掌握,即通过发音和感知区别确定其部分,根据可能出现的环境确定其分类——这就是之后大家熟知的“分布主义”和“积木式”概念,如前所述是洪堡特所反对的做法。有一段时间,美国结构主义者甚至试图忽略意义,即便谈到了意义,也抱着一种从未被提出讨论过但普遍存在的假设,即交流是一种编码-解码过程,话语的意义全都在所使用的词语和结构当中。这种假设之所以形成,部分原因是局限于书面语言。它们严重地阻碍了 20 世纪的语言学工作。

正如 Noonan (1999) 所指出的,结构主义存在很多问题:<sup>11</sup>

a. 范畴根据关系而非实体来定义;

---

<sup>11</sup> 如上所述,并非所有结构主义者都赞同索绪尔和布隆菲尔德的这些存在问题的观点,例如伦敦学派(弗斯,1890-1960,及其学生,特别是韩礼德,1925-2018)和布拉格学派(雅柯布森,1896-1982,他创造了“结构主义”一词;特鲁别茨科伊,1890-1938,马泰休斯,1892-1945,卡尔采夫斯基,1884-1955,特伦卡,1895-1984,马丁内,1908-1999,瓦赫克,1909-1996)。伦敦学派认识到意义依赖于环境,因此主张对整个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另外与现代观点很像的是,他们认为语言是多重互动系统,而非单一系统。布拉格学派没有严格区分共时和历时,而是强调意义的重要性。他们也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开端,因为他们强调语言在交际中的功能(例如 Jakobson 1960 讨论了语言的功能,这与索绪尔的自主原则背道而驰,但与洪堡特的想法如出一辙,即我们需要考虑到整个交际行为)。他们还将甲柏连孜关于心理主语和心理谓语的观点发展为“主位-述位”结构,从而引发出现在的信息结构理论。

- b. 拘泥于离散范畴；
- c. 不能充分地处理语言的变异；
- d. 无法在动态和时间框架内处理语言；
- e. 在处理语言变化问题上存在困难；
- f. 区分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知识。

Weinreich et al. (1968) 也批评了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具有同质性的观点，主张将语言视为异质的，他们指出：“掌握了异质的语言结构，并不就成了多方言主义 (multidialectism)，或只是‘单纯’的表现问题，而正是单语语言能力的一部分。” (Weinreich et al. 1968: 101)。

## 8. 我的立场

认为“语言学是对语言的科学研究”，而不是对交流的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交流行为的研究，对语言学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忽视了整个交流过程以及所有其他因素（如忽视了交流的认知基础，即在意义创造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忽视了除手语之外的非语言交流），<sup>12</sup>使得语言学成为象牙塔，好像只有构建理论与它有关，其他什么都与它无关，这导致语言学博士很难在学术圈之外找到工作。

现代语言学并不是从索绪尔和结构主义者开始的，但确实是那会语言学家开始把语言结构从其使用中剥离出来（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除外），如此一来，交流行为（语言使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和交流中使用的语言形式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乔姆斯基在这方面最为极端，完全否认了交流与语言结构的关系。事实上，乔姆斯基比早期的许多结构主义者如霍凯特 (Hockett 1968、1977) 都更结构主义，因为他不仅将结构从使用中剥离出来，还提出了没有实证基础的假设，即存在一个严格的、封闭的语言系统。Hockett (1967[1977]: 256) 在其学术生涯即将结束时说：“除了我们所讨论的因素和机制所暗示的设计之外，语言没有设计。试图寻找一个可以精确描述一门语言的确切而固定的形式系统，只会白费心机，因为一种语言既不是也不反映任何这样的系统。一种语言并不像索绪尔所想的那样，是一个‘所有（部分）互相牵制 (où tout se tient)’ 的系统，而是如萨丕尔所说的那样‘所有语法都会泄漏 (all grammars leak)’。”

此外，还有其他学者指出了结构主义特别是乔姆斯基假设的问题，但都被忽视或诋毁了：

德怀特·鲍林格 (Dwight Bolinger, 如 Bolinger 1961、1976) 提出了类似于图式/构式的东西，称之为“习语”，以及图式的组合，称之为“句法混合”（可以形成新的句法结构），并试图表明“习语的痕迹渗透了整个语法系统” (1961: 366)——这种看法领先于他的时代。他反对纯粹的语法生成观，认为语法的使用，部分是创造的，部分是记忆的：“目前，我们无法判断像 *I went home* 这样的句子有多少是发明的，有多少是重复过去，因为在此之前已有无数说话者说过它并把它完整地传递给了我们。语法到底是场合适合时说话者从中‘生出’（即来源）结构的东西，还是从预先建立好的清单中‘取出’结构的东西？……也许，这两个方面都有……” (1961: 381) 这方面的一个推论是：词汇、形态和句法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因为它们形成了广泛用法和特定用法（即它们的固定程度）的连续性（见 Bolinger 1976: 3；比较 Langacker 1987）。

罗伊·哈里斯 (Roy Harris) 的《语言迷思》 (1981, *The Language Myth*, Duckworth, London 出版)。哈里斯把那种认为语言的功能是将思想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工具的想法称为“思想传递谬误 (telementational fallacy)” (比较 Reddy 1979 的“传导隐喻”)，把那种认为

<sup>12</sup> 我认为，交流不是编码和解码，而是一个人做某事，抱着让另一个人推测其做该事的意图，之后另一个人推测出了他的意图。这是人类使用溯因推测来创造意义的本能反应，各种知识（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语言形式的经验）都参与了对理解过程的制约。这一观点的概要可参 LaPolla (2015)。

语言的机制是形式具有不变意义的想法称为“确定谬误 (determinacy fallacy)” (或“固定代码谬误 (fixed code fallacy)”) 他说：“这种语言迷思假设，语言是一套有限的规则，可以产生无限的配对，一方面是声音序列或书面字符序列，另一方面是意义；正是这种规则的知识把个体结合成语言社区，能够按照由这些规则决定的预先安排来相互交换思想。” (Harris 1981: 11)。正如哈里斯在书中表明的那样，语言使用事实上不是确定的，也不是统一的；哈里斯转而主张的“整合主义”语言学，承认交流经验的所有方面的全时性 (cotemporality)，即把同时发生的所有交际行为放在一起讨论)。“……语言行为在整合到经验序列之中时，相对于非语言行为没有什么特别。” (Harris 1981: 156)

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发表的论文中，我与马丁·哈斯普马特 (Martin Haspelmath) 和马修·卓尔 (Matthew Dryer) 进行了争论，主张不光要看句法结构的表面，还要看它们背后的所以然。他们坚持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如区分语言和言语，并将结构看作是自主的。<sup>13</sup>在那场争论中，我谈到了小句结构背后的原则，如信息结构和语法语气的标记。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词语和模式如何反映说话者对世界的理解，这是早期的语言类型学家实践过的，也是目前的认知语言学家如莱拉·博格迪特斯基 (Lera Boroditsky, 如 2001、2011) 所倡导的。我们应该把语言视为我们称之为交流的合作活动的一部分，正如洪堡特和目前的互动语言学所主张的那样；而在研究结构时，应该考虑整个环境，正如洪堡特和目前的极点构式语法所实践的那样 (如 Croft 2001、2013)。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须要看说话者在哪些语义领域会强制制约预测 (如英语和德语强制性地标记时态，而汉语没有)，看他们如此制约的程度 (如英语区分 *She sings* 和 *She is singing*，但德语只有 *Sie singt*)，以及在制约时使用了哪些具体的形态句法手段。比如说，汉语中有例 (1a) 那样的句子，对谁在洗头没有显性的约束，而英语例 (1b) 需要在名词 *hair* 前加一个属有饰词，而日旺语的例 (1c) 会使用动词反身/中动后缀来制约对谁的头发被洗的理解，以此达到与英语例子一样的效果，只不过使用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形态句法手段，代表了对所描述情况的不同理解 (来自 LaPolla 2015: 42, 更多讨论和例子见该论文)。<sup>14</sup>

- (1) a. 他在洗头发。  
b. He is washing his hair. <sup>15</sup>  
c. àng nī zǐl-shì-ē.  
3SG 头发 洗-R/M-NPAST  
“他正在洗他/她的头发。”

还有一种类似且同样有用的方法，是 Heine (1993、1994、1997a/b; Heine & Claudi 1986、Heine & Kuteva 2001) 讨论了表达比较构式、属有构式和助动构式的不同模式的语法化背后的认知隐喻 (事件图式、来源图式)。这些事件图式代表了针对事态的概念化方式，并导致了特定类型的语法化。例如，说话者是否将一个比较情形 (Heine 1997a) 视为动作 (超过) 图式、位置图式、来源图式、目标图式、是非图式 (Polarity schema)、序列图式、相似图式或话题图式，这将决定它们用什么样的结构来表达这种情形。即使在各种汉语类型中，我们也能发现这方面的差异。例如，古汉语既有位置图式 (例 2a; 在许多汉藏语言中都发现了这种类型)，也有典型的话题图式 (例 2b); 南方方言 (以及邻近的非汉语语言) 的结构往往是

<sup>13</sup> 他们尽管接受结构主义关于语言/能力和言语/表现的区别，但认为重要的是言语，而语言可以被忽略；这与乔姆斯基不同，因为他认为语言才是重要的，而言语可以被忽略。

<sup>14</sup> 例子中使用的标记符：CL 表示分类词 (classifier)；LOC 表示方位动词或介词 (locative verb or adposition)；NPAST 表示非过去式标记 (non-past marker)；POSS 表示属有标记 (possessive marker)；PN 表示人名 (personal name)；R/M 表示反身/中动语态标记 (reflexive/middle voice marker)；SG 表示单数 (singular)。

<sup>15</sup> 需要注意，相对汉语和日旺语，英语更多地制约对第三人称所指的推测，因为它区分了性别和生命度。

动作（超过）图式（例 2c，来自 Ansaldo 2010: 925）；而北方方言则表现出一种与古汉语不同的话题图式（例 2d；比较 Tsao 1989）。

- (2) a. 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孟子·梁惠王上》）  
b. 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孟子·公孙丑》）  
c. 佢快过我。  
d. 他比我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s9K7fOCNAc>)

属有概念也可以有多种理解和表达，比如普通话体现为话题图式（3a）、藏文体现为目标图式（3b），羌语体现为属格图式（3c）或动作图式（3d）——取决于被占有的对象在物理上是可让渡还是不可让渡的。

- (3) a. 我有一双小毛驴 (<https://www.storm.mg/article/552452>)  
b. rgyal-po-la                      ralgri   yod (Beyer 1992: 269)  
   国王-GENDER-LOC 剑        存在  
   “国王有一把剑”（逐字翻译：“对/在国王一把剑存在”）  
c. qa-dzoqu-ji-tua    wa (LaPolla with Huang 2003: 97)  
   1SG-腿-两-CL    存在  
   “我有两条腿”（逐字翻译：“我的两个腿存在。”）  
d. khumtsi    tutṣ    ʏzə-zi    zṑ-zṑ. (LaPolla with Huang 2003: 98)  
   PN        弟弟 四-CL    存在-CAUSATIVE  
   “Khumtsi 有四个弟弟。”（一种及物致使小句，属有者是施动者，被属有者是受动者）

我们也可以从词汇上来比较说话者是如何划分世界的。例如，英语用一个单词 new 来表示“全新的”和“对所有者来说是新的”，而法语会使用两个不同的词：neuf 表示“全新的”，nouveau 表示“对所有者来说是新的（不一定是新造的）”。再比如，英语 have 可以表示属有和临时方位，例如 I have a pen (=我拥有一支笔) 和 Do you have my pen? (笔并非归他所有，而只是临时在他手里)，而普通话的“有”只表示所有权（4a），不包括临时方位，后者由方位构式来表达（4b）。

- (4) a. 我有一支笔 ([http://www.sohu.com/a/218824469\\_100009835](http://www.sohu.com/a/218824469_100009835))  
b. 我的笔在你那儿吗？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0061914.html>)

我的主要观点是，语言学的目标不应该是抽象地理解语言形式，仿佛它们是某种特殊的東西，但事实上它们只是交流中的一种行为方式；我们应该去理解人类心智如何创造意义，它理解世界有多少种不同的方式，以及这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简而言之，我们可以通过追根溯源、鉴古知今来使类型学更加现代化、更具实证性和科学性。

## 参考文献：

- 柏寒夕. 2013. 《德国汉学家甲柏连孜<汉文经纬>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洪堡特著, 姚小平译. 1999.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甲柏连孜著, 姚小平译. 2015. 《汉文经纬》.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甲柏连孜著, 温仁百译. 2020. 《普通语言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黎锦熙. 1924. 《新著国语文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黎锦熙. 1953. 中国语法中的“词法”研讨. 《中国语文》第 9 期.  
李保平. 2010. 《甲柏连孜<汉文经纬>汉文引例校笺》.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李方桂. 1951[2013]. 藏汉系语言研究法. 《汉藏语学报》第 7 期; 原刊《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 2 期.  
萨丕尔著, 高一虹等译. 2011. 《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萨丕尔著, 陆卓元译. 1985. 《言论——言语研究导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克仲. 1986. 古汉语动宾语义关系的制约因素. 《中国语文》第 1 期。
- 王力. 1985. 《中国古语法》. 载: 《王力文集》(第三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沃尔夫著, 高一虹等译. 2001. 《论语言、思维和现实》.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Aarsleff, Hans. 1988. Introduction. In first ed. of Heath's translation of Humboldt (1836[1988]), vii-lxv.
- Ansaldo, Umberto. 2010. Surpass comparatives in Sinitic and beyond: Typolog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Linguistics* 48.4: 919-950. DOI 10.1515/LING.2010.029
- Aristotle. 1962. *The categories on interpretation & prior analytics*. London: Heineman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eb's Classics].
- Auer, Peter, Elizabeth Couper-Kuhlen, and Frank Muller. 1999. *Language in time: the rhythm and tempo of spoken inter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uer, Peter. 2009. On-line syntax: Thoughts on the temporality of spoken language. *Language Sciences* 31: 1-13.
- Beames, John. 1868. *Outlines of Indian philology*. London: Trübner and Company.
- Beyer, Stephan V. 1992. *The Classical Tibetan language* (SUNY Series in Buddhist Studi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isang, Walter. 2013. Die 'Chinesische Grammatik' vo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aus typologischer Sicht. Preface to the reprint of: Gabelentz, G. von der. 1881.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e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T. O. Weigel. Tübingen: Stauffenburg.
-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 Holt and Company.
- Boas, Franz. 1911. Introduction. In Franz Boas (ed.),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1-83.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 Bolinger, Dwight L. 1961. Syntactic blends and other matters. *Language* 37: 366-381.
- Bolinger, Dwight L. 1976. Meaning and memory. *Forum Linguisticum* 1.1: 1-14.
- Boroditsky, Lera. 2001. Does language shape thought? English and Mandarin speakers' conceptions of time. *Cognitive Psychology* 43.1: 1-22.
- Boroditsky, Lera. 2011. How language shapes thought: The languages we speak affect our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Scientific American* 304.2: 63-65. DOI 10.1038/scientificamerican0211-62
- Bowerman, Melissa, & Soonja Choi. 2003. Space under construction: Language-specific spatial categorization in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D. Gentner, & S. Goldin-Meadow (eds.), *Language in mind: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thought*, 387-427. Cambridge: MIT Press.
- Bowerman, Melissa. 2004. From universal to language-specific in early grammatical development [Reprint]. In K. Trott, S. Dobbinson, & P. Griffiths (eds.), *The child language reader*, 131-146. London: Routledge.
- Bowerman, Melissa. 2007. Containment, support, and beyond: Constructing topological spatial categories in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M. Aurnague, M. Hickmann, & L. Vieu (eds.), *The categorization of spatial entities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177-203. Amsterdam: Benjamins.
- Brown, Roger W. and Eric H. Lenneberg. A study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454-462 (1954).
- Burnouf, Eugene. 1825. Review of "Vergleichende Zergliederung der Sanskrita-Sprache und der mit ihm verwandten Sprachen. Erste Abhandlung: Von den Wurzeln und Pronomen erster und zweiter Person" by Franz Bopp.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1825: 117-148. *Journal Asiatique* 6: 52-62, 113-124.
-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2013.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G. Trousdale and T. Hoffman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211-23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belentz, Georg von der. 1881.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e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T. O. Weigel.
- Gabelentz, Georg von der. 1891[1901].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hre Aufgaben, 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 2nd edn. Leipzig: Tauchnitz.
- Gobineau, Joseph Arthur de. 1854–5.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4 volumes). Paris: Firmin-Didiot et Compagnie.
- Greenberg, Joseph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Universals of language*, ed. by J. H. Greenberg, 73-113.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London: Arnold.
- Harris, Roy and Talbot J. Taylor. 1997. *Landmarks in linguistic thought 1: The Western tradition from Socrates to Saussure*,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arris, Roy. 1981. *The language myth*. London: Duckworth.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1.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languages: Some general observations. In R. M. W. Dixon and A. Y. Aikhenvald (eds.),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Case studies in language change*, 225-2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and Ulrike Claudi. 1986. On the metaphorical base of grammar. *Studies in Language* 10.2: 297-335.
- Heine, Bernd. 1993. *Auxiliaries: Cognitive forc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1994. Areal influence on grammaticalization. In Martin Putz (ed.), *Language contact language conflict*, 55-68.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amins.
- Heine, Bernd. 1997a.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grammar*. N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1997b. *Possession: Cognitive sources, forc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rforth, Derek D. 1987. A case of radical ambiguity in Old Chinese: Some notes toward a discourse-based grammar. *Suzugamine Joshi Tanki Daigaku Bulleti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4: 31–40.
- Hockett, Charles F. 1967[1977]. Where the tongue slips, there slip I. In: To honor Roman Jakobson: *Essay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11 October 1966*, 910-36. The Hague: Mouton. [Reprinted in Hockett 1977, 226-56.]
- Hockett, Charles F. 1968. *The state of the art*. The Hague: Mouton.
- Hockett, Charles F. 1977. *The view from language*.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Hopper, Paul J. 1992. Times of the sign: on temporality in recent linguistics. *Time and society* 1(2): 223-238.
- Hopper, Paul. 2011. Emergent grammar and temporality i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In P. Auer & S. Pfänder (eds.), *Constructions: Emerging and emergent*, 22-44.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Hopper, Paul. 2012. Emergent grammar. In James Gee & Michael Handford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301-314.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Humboldt, Wilhelm Freiherr von. 1836[1988]. *On language —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struc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ranslated by Peter Hea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Humboldt, Wilhelm von. 1827. *Lettre à m. Abel-Rémusat, sur la nature des forms grammaticales en general, et sur le génie de la language chinoise en particulier*. Paris: Dondey-Dupré père et fils. Available at <https://archive.org/search.php?query=source%3A%22http%3A%2F%2Fbooks.google.com%2Fbooks%3Fid%3DmW9GAAAAMAAJ%26oe%3DUTF-8%22>
- Humboldt, Wilhelm von. 1903-1936. *Gesammelte Schriften*. 17 Volumes. Ed. by Albert Leitzmann. Berlin: Behr.
- Humboldt, Wilhelm von. 1997. *Essays on Language*. Ed. by T. Harden and D. Farrelly. Frankfurt: Peter Lang.
- Jakobson, Roman. 1960.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homas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 350-449.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Joseph, John E. 1999. A Matter of Consequenz: Humboldt, Race and the Geniu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26.89-148.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1993. Arguments against 'subject' and 'direct object' as viable concept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3.4:759-813.
- LaPolla, Randy J. 2003. Why languages differ: Vari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ference. In David Bradley, Randy J. LaPolla, Boyd Michailovsky & Graham Thurgood (eds.),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113-144.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 LaPolla, Randy J. 2009. Causes and effects of substratum, superstratum and adstratum influence, with reference to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n Yasuhiko Nagano (ed.), *Issues in Tibeto-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75), 227-237.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LaPolla, Randy J. 2013. Arguments for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In *Huma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edited by Tseng Chiu-yu, 33-57. Taiwan: Academia Sinica.
- LaPolla, Randy J. 2015. On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a cultural connection for all aspect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Rik De Busser & Randy J. LaPolla (eds.),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33-44.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aPolla, Randy J. 2016. On categorization: Stick to the facts of the 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20.2: 365-375.
- LaPolla, Randy J. 2017. Causation as a factor and goal in typological comparisons. *Linguistic Typology* 21.3: 547-554.
- LaPolla, Randy J., with Chenglong Huang. 2003. *A grammar of Qiang, 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 (Mouton Grammar Library 39).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Noonan, Michael. 1999. Non-structuralist syntax. In Michael Darnell, Edith Moravcsik, and Michael Noonan (eds.), *Functionalism and formalism in linguistics Vol. 2*, 11-31.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Studies in Language Companion Series 42].
- Reddy, Michael J. 1979. The conduit metaphor—a case of frame conflict in our language about language.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284-3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nan, Ernest. 1858. *De l'origine du langage* (deuxième édition, revue et considérablement augmentée). Paris: Michel Lévy, Frères, Librairies-Éditeurs.
-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Also available as www.gutenberg.net EBook #12629.
- Sapir, Edward. 1929[1949]. 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a science. *Language* 5: 207-14. Also in David Mandelbaum (ed.), *Selected writings of Edward Sapir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1949).
-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16.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ited by C. Bally & A. Sechehaye, assisted by A. Riedlinger. Lausanne and Paris: Payot.
- Serruys, Paul L-M. 1981. Towards a grammar of the Shang bone inscrip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udies, August 15-17, 1980*, 313-36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Steinthal, Heymann. 1850. *Die Classification der Sprachen dargestellt als die Entwicklung der Sprachidee*. Berlin: Ferdinand Dümmler's Buchhandlung.
- Steinthal, Heymann. 1860. *Charakteristik der hauptsächlichsten Typen des Sprachbaues*. Berlin: Ferdinand Dümmler's Verlagsbuchhandlung.

- Swiggers, Pierre. 1986. Review of *Brief an M. Abel-Rémusat: Über die Natur grammatischer Formen im allgemeinen und über den Geist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im besonderen* by Wilhelm von Humboldt. Nach der Ausgabe Paris 1827 ins Deutsche übertragen und mit einer Einführung versehen von Christoph Harbsmeier. (*Grammatica universalis*, 17). Stuttgart—Bad Cannstatt: Friedrich Frommann Verlag—Gunther Holzboog, 1979. *Language* 62.2: 456-57.
- Tobin, Yoshua. 2006. Structuralist phonology: Prague School. In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vol. 12, 170-177. Oxford: Elsevier.
- Trabant, Jürgen. 2016. Theses on the future of language. In Birgit Mersman and Hans G. Kippenberg (eds.), *The Humanities between glob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135-140. Berlin: de Gruyter.
- Tsao, Feng-Fu. 1989. Comparison in Chinese: A topic-comment approach.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9.1: 152-189.
- Weinreich, Uriel, William Labov, and Marvin I. Herzog. 1968.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In W. P. Lehmann and Yakov Malkiel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 symposium*, 95-195. Austin &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Whorf, Benjamin L. 195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John B. Carroll. Cambridge, MA: MIT Press.